

第一章 概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跌宕起伏,绚丽多姿,历久而弥新,不仅是世界上曾经一度走在前列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自己历史的文明古国。但由于众多文化概念和理论难以达成共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本深刻揭示中国文化史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的史学著作问世。这种状况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一直没有中断自己的文化史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缺憾。为准确把握中国文化史的发生、发展与演变机制,必须对中国文化史的有关概念和特征予以界定,以便为中国文化史的论述提供较为坚实的立论基础。

第一节 文化与中国文化史释义

“文化”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最基本概念;“中国文化史”则是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特殊范畴。因此,有关“文化”与“中国文化史”的内涵与外延的确定,不仅关系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而且决定着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和有关理论,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一番理论探讨。

一、文化内涵与外延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经历了由‘文’与‘化’各自为词到组成“文化”一词的过程,其含义由精神现象扩展到人类创造行为与成果,体现了内涵和外延不断被拓展的特点。

“文”的本意,指的是色彩交错的纹理。《周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由此,“文”被引申为装饰、修整和人为加工与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性符号,再被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言辞文章和德行道义、美善文德等。

“化”的本义为生成、造化、变易等,指的是两种事物一方或双方的形态与性质发生变化。由此而被引申为教行、迁善和“化而成之”等。

“文”与“化”连在一起使用,大概始自战国。《易·贲卦》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此,天文与人文相对应,“文”与“化”连用,已带有“以文教化”的意义。

西汉后,“文化”才作为固定词出现,含义大都是以文教化,即以封建伦理道德来教化世人,并与武力征服相对应。刘向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①自此以后,在古汉语中,“文化”的含义基本没有多大扩展。

在西方,“文化”一词也带有“以文教化”的含义。英文“culture”源于拉丁文“cultura”,本义为耕作、居住、练习、留心、注意、敬神等,在英文中则引申为对树木和禾苗的栽培,并进而扩展为对心灵、知识、情操和风尚的塑造与培养等,表明“culture”一词的含义

^① 《说苑·指武》。

是由人类物质生产活动逐渐向精神创造活动延伸的，与古汉语“文化”所带有的“以文教化”含义大体一致。

“文化”作为内涵异常丰富概念的阐发和研究，始自欧洲。伴随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学者发现，不同地域的文化，内容及性质大相径庭；即使同一地区的文化，也并不是一成不变，而呈现为一种动态性变异特征。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地域和时间上的差异性，诱发了对文化内涵与外延的探讨与研究，不仅促使人类文化学、民族文化学、社会文化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产生，而且也导致了文化含义具有多样性。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关于“文化”的定义有200多个。如此众多的“文化”定义，使初涉文化学的人无所适从，甚至连文化学界的精英也感慨万千：“关于文化的争论，变化多端，而且愈来愈激烈。”^①

关于文化定义，在国外，主要有人类学派文化定义、传播学派文化定义、历史地理学派文化定义、功能学派文化定义、结构学派文化定义、文化形态史观学派文化定义、新进化论学派文化定义、符号文化学派文化定义等。

在国内，近代学者在深厚国学基础上汲取融会外来文化观，提出了一些较为独到的见解。梁启超是对文化含义探讨较早也较深的一位学者。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②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各种业果而言。^③继梁启超之后，学者或多或少涉及到文化概念。蔡元培说：“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④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⑤；“是生活的样法”^⑥。陈独秀说：“文化是对军事、政治、产业

① 路易·多洛：《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12月7日。

③ 《蔡元培美学文集》，第1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63年。

④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一章，学林出版社，1987年。

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辽宁大学哲学系自编教材。

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种。^①冯友兰则认为，文化是一种“总合体”；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之总合体。^②近代文化学专家黄文山指出：“文化的内容，是由人类过去的遗业所构成的。所谓遗业，在性质上是积累的，而积累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现象”；文化现象以内部状态为最重要，故心理的、统形的方法，值得重视。^③显然，在近代，中国学者的文化观已带有现代文化含义的韵味。

不过，在以往文化含义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要么注意外在文化创造物的发展，忽视了文化创造者的能动作用和人自身的再造过程；要么注意人这个主体对于文化的创造，但忽略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放弃了对物化文化的研究。这两种倾向都能够导致文化研究中内化和外化的脱节、文化主体与客体的割裂，从而使文化的本质与外延难以得到深刻而准确的把握。

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人是主体，客体是自然。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指自然界，而且也包括人类自身的各种自然属性。文化学的出发点，即在于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有了人，就开始有了人类历史，也便有了文化。文化与人类俱来，人类与文化同长。人创造了文化，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身。因此，任何人都只能是以时代的人而存在，是时代文化所塑造的一种结果。任何超时代的人，不仅过去没有，即使将来也不可能存在。人类诞生之初，“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④“人道”少得可怜，但远古人类终归还是拥有了文化塑造在其内。伴随时代不断发展，在“人道”越来越被人类所拥有的同时，社会也趋向更加文明，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文化也相应地表现为量的逐渐增加和质的不断升华。因

①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②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第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③ 黄文山：《文化学的方法》，《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此,任何人类文化的进步,都无一例外地包括通常所说的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和人类自身各种自然属性的“自然的人化”这两个方面。

因此,我们可以为文化下这样一个本质性的定义:文化即是人类化,既是自然的人化,也是超过人的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

从文化的这个定义出发,文化的外延既包括外在文化产品制造,也包括内在文化塑造。所谓外在文化,指的是人对客观存在物的创造,是人类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改造客观自然,使外在客观获得人类灵气而变成文化产品,即通常所说的自然文化,或文化物化。所谓内在文化,是指文化对人类自身所带有的动物属性的不断克服和文化属性的不断提高。内在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是在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中得以升华的。这样,在文化被创造和人自身被塑造的双重过程中,外在文化与内在文化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了统一,也为文化与文化史研究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和基本出发点。

关于文化构成,通常解释是,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①如此界定文化的外延似乎存在较大的缺陷。这是因为,如果仅仅将文化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部分,那么,人类创造文化的行为,即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时的“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将属于何种文化?人类自身自然属性被改造所体现的文化又属于何种文化?

有的学者将文化的外延规定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大类别,技术体系指人类加工自然形成的技术的、器物的、非人格的、客观的东西;价值体系指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两者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

^① 《辞海》,缩印本,第 1533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年。

文化统一体，组成广义文化的全部内容。这种文化定义不仅同样没有将创造文化主体人的行为也纳入文化范畴之中，而且对于语言和社会结构这两种人类文化现象所给予性质的确定也带有一定偏颇之处。

此外，关于文化构成还有三层构成说，认为文化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体系构成；有四层构成说，认为文化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风俗文化和思想与价值文化四个层面组成；有多层结构说，认为文化由物质文化、社会关系文化、精神文化、艺术文化、语言符号文化、风俗文化等六大体系构成。显然，这些观点也都具有自己的合理性，但也有一定的偏颇之处。

其实，对于文化的外延，前人曾作过极为精彩的论述。龚自珍即说：“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于饮食，中乎制作，终于闻性与天道。”^① 这表明，龚自珍不仅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意识文化三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明确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物质文化（饮食）是人类的基础性文化，意识文化（天道）是较高层次的统帅性文化，而行为文化（制作）则是连接物质文化与意识文化的桥梁。

从文化的广义概念上去探讨人类文化的外延，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文化构成无外乎由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意识文化三部分组成。对此，有的学者已进行了较为恰当的描述：

可以从文化要素的不同上把文化划为三大块，即意识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在意识文化中，意识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物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物质文化产品则恰巧相反，它的功能作用全是物质性的，其意识只表现为该产品是按意识要求制作和运转的，其意识是为它的物质功能服务

^①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

的……(行为文化)是因为它受意识调节并作为意识的外化而存在……以其浓厚的意识性和坚实的物质性并重的状态而存在。在行为文化的两端是意识文化和物质文化,意识文化通过行为文化向物质文化转变。①

从此种文化外延出发,人类文化不仅可以划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意识文化三大体系,而且可以看到构成文化的各种文化体系皆具有极其浓厚的综合性特征,即各种文化体系都能够体现出物质的、行为的和意识的文化特色,从而使不同文化外延呈现为相互交叉与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从而为中国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二、中国文化史含义

对于中国文化史的命名,既有称为‘中华文化史’者,也有称为“中国文化史”者,还有称‘华夏文化史’者。我们认为,还是称‘中国文化史’较为妥当。

在这诸多不同的称谓中,文化的含义已予以界定,因而关于文化史的含义可界定为:文化史是指有关人类文化发生、发展与演变历史规律的一门科学。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弄清楚关于“中国”、“中华”、“华夏”等词含义的不同之处。

在语义上,“中国”、“中华”与“华夏”既有联系又存在本质性差异。从含义上看,在古代,“中华”与“华夏”主要是指中国境内文化先进的民族。“华夏”是汉族先民的古称,指的是居住在以伊洛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炎黄部族及其后裔。到春秋之际,“楚失

①韩民青:《文化论》,第102~10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年。

华夏^①“裔不谋夏，胡不乱华”^②等话已成为文人的口头禅，说明此时“华夏”已是中原人的自谓之语。“中华”一词由“中国”与“华夏”二词复合而成，意为居住于天下中心且文化优越的民族。此词约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际。《魏书·礼志》说：“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处中华，德祚微浅。”

与之相比，“中国”一词的含义更为广泛而深刻。“中国”一词在出现之际便带有国家的含义。“中国”作为我们国家的名称，其核心在于一个“中”字，其含义不仅是大一统国家的正统名称，而且还能反映中国人自古以来即存在的“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观念。固然，这些意识带有错误和偏见，但错误和偏见本身即是历史真实的一种体现。

“天下中心”为“中国”一词的本义。自夏代开始，中国人即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中心，周边国家不过为“四夷”而已。因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为中原地区，致使这一地区早在夏代即被视为“四海”、“四夷”和“天下”的中心。《尚书·大禹谟》说：“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在文献中，“中国”一词首见于《尚书·周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在实物史料上，迄今所见当为西周初年的《何尊》。其铭文为：“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因此，“中国”一词的本义应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之中”的国家，为四方之中，世界之中。为此，《诗经·大雅·民劳》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中国”所带有的“文化中心”含义，是中国文化史自身发展的一种体现。在历史上，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首先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并长期走在周边地区的前列。崛起于中原地区的

①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② 《左传·定公十年》。

王朝,被称为‘中国’;因其文化先进又被称为‘华夏’。这里的‘夏’为王朝名称,而‘华’,则带有文化灿烂的意思。因此,中原这片哺育中国文明诞生和繁荣的沃土被视为拥有高度文明的“化内之地”,而把农耕文化发展水平较低和游牧文化分布的周边地区称为“化外之地”,从而产生了‘南蛮’、‘北狄’、‘西戎’和‘东夷’等称谓。虽然,此类称谓伴随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了解的逐渐拓展而呈现不断有所改变的趋势,但直至近代,仍将西方人称为‘夷’、‘夷人’和“夷类”。这说明,在以往中国人心目中,“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曾是左右中国人的行为和意识的一种痼疾。

汉代扬雄即是从‘文化中心’和‘天下中心’的双重含义上来解释‘中国’一词的:“孰为中国?曰:王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①正因为将中国视为文明的渊薮,世界的中心,从而才将中国称为‘中华’。对此,《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中国”作为东亚大陆上建立起来的统一、合法、正统国家的惯用称谓,则是由“文化中心”所引申出来的第三种含义。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一王朝的称谓固然不同,但无不以‘中国’相称,无论是汉唐,还是宋元,或是明清。历代统一王朝之所以被统称为中国,所表明绝不仅仅在于这个国家为‘天下之中’,而且还带有该王朝是合法的正统国家的含义。“合法”与“正统”的根基即在于文化传统。

固然,将‘中国’作为‘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带有极大的偏见,是一种夜郎自大的表现,但这种意识也曾对中国人所拥有的特别“天下文化观”的树立和中国文化所带有的醇厚、平和色彩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难见“世界”一词而多见

^①扬雄:《法言》卷四,《问道》。

“天下”字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使“平天下”成为最高的理想追求。而且“国”与“天下”的含义往往相通,因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与“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①相一致。在中国古代史中,大量热血男儿保家卫国的记载连篇累牍,却看不到依靠武力“平天下”的半点痕迹。相反,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②,以仁政“陶冶万物,化正天下”^③的说教却汗牛充栋。这表明,中国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一种非强权的、和平主义的、以先进文化来改造和替代落后文化的“世界主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梁启超才把“世界主义之光大”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④

在“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意识的支配下,中国人逐渐被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意识所窒息,不仅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步伐,而且使中国文化在近代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改造。当西方文化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中国人仍然沉浸在“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自我蒙骗和陶醉中。第一次对中国人这种意识带来震撼的,是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这位传教士带来了一张反映欧洲文艺复兴晚期地理学成就的地图,名为《万国全图》。图上的中国并不处于世界中心,而是在远东一隅。对此,朝野议论纷纷,表示异常愤慨,谓“其说荒谬莫考”。^⑤因此,利玛窦只得将中国的位置改到了世界中心,并命名为《山海輿地图》才得以印刷出版。由此可见,“天下中心”意识对古代中国人影响程度之深。

“文化中心”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更令人心碎。18世纪末叶,经过产业革命洗礼的英国已成为最先进的国家,海外殖民活动遍及

① 《日知录·正始》。

② 《论语·季氏》。

③ 《汉书·贡禹传》。

④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

⑤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国》七。

非洲、美洲和中东及南亚，并步步逼近远东。此时，主宰中国的即是那个对外部世界毫无了解的乾隆皇帝。他曾大言不惭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①甚至鸦片战争已爆发，觉悟的中国人开始踏上救国救民之路，还有一大批复古倒退者没有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解脱出来，一味阻止外来文化的传入。如此心态，严重阻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步伐，甚至使中国近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以“中国文化史”来界定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历程，不仅意义更为广泛，而且本身即是中国文化史的一种体现。

正是鉴于此，我们将中国文化史的含义界定为：中国文化史是探讨中国文化发生、发展与演变历程及其规律的学科。

第二节 中国文化史特征

由于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所决定，中国文化史具有异常明显的特征。文化生态环境是由地理、经济、社会结构、周边文化的发展水平及传播能力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是文化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必要前提条件。特有的文化生态环境，不仅是孕育中国文化特色的琼浆玉液，也是塑造中国文化史特征的阳光雨露。因此，对中国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史特征予以探讨，不仅是中国文化史孕育与成长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也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特色赖以形成的重要课题。

^①梁廷枏：《粤海关志》，《贡舶》三。

一、多元性与独立性

自然环境是文化史发展的基础之一。特定的地理环境不仅导致特殊文化的产生，而且对于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制约作用。

对此，中国古代学者已有觉察。《礼记》中探索文化差异原因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易。”^① 明代人杨慎则认为：“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圉也……习也者，则系乎君之令，师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② 如此既重视地理环境对于文化形成的基础作用，又强调人文因素在文化形成中的能动作用的文化地理观，较之《汉书·地理志》等古文献将不同文化的形成单纯归因于地理环境更加完备和深刻。

中国地理环境的显著特点，是疆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但带有极大的封闭性，是典型的‘大陆—海岸型’国家。基于此，中国文化史呈现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文化史孕育上具有多元性，而在发展上则缺少开拓性，具有异常浓厚的保守性和独立性。

辽阔的疆域为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起源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现在，中国疆域面积达 960 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三位。因此，仅诞生和养育中国旱作农业文明的黄河流域即达 75 万平方公里，而诞生和养育水田农业文明的地域则多达 180 万平方公里。与此相比，诞生和养育世界其他古代文明

① 《礼记·王制》。

② 杨慎：《贵州乡试录·序》，《升庵集》卷二。

的地域则显得异常狭窄。埃及文明诞生地，将尼罗河所滋润的“下埃及”三角洲地带和“上埃及”狭窄河谷平原加在一起也不过 4 万平方公里。巴比伦文明发祥地的两河流域，面积虽比古埃及文明大一些，但也有限。印度文明发祥地，包括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莫恒达区域和恒河流域、德干高原在内也不过 79 万平方公里。而希腊文明则被局限在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滨海小平原上。玛雅文明囿于美洲山地和丛林，印加文明也未曾走出过安第斯高原。这说明，中国文化自诞生那天起，由于辽阔疆域所决定，必然要走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路。

与仅仅依托一条河流或一个高原及一个气候带孕育和成长起来的其他古老文明相比，孕育和滋生中国文明的为黄河和长江两个流域、两个气候带乃至更为广阔的地域。中国文明最为重要的发源地为黄河流域。肥沃而疏松的黄土和温带气候条件，使黄河流域成为中国农耕文化发源地之一，因而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流域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湖泊众多，是著名水乡，既为水田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也为水乡特有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而使长江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二条“母亲河”。此外，珠江流域、辽河流域，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从地形地貌和气候类型上看，中国地形自东向西可划分为沿海低洼平原地带、平原向高原过渡地带以及高原地带三种类型；气候自北向南可划分为亚寒带、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等六种类型。而且，中国大部地区为北温带和暖温带气候，其次为亚热带气候。由于温带和暖温带气候适中，能为人类提供较为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因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和繁荣区。中国所处的北温带和暖温带，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不仅为人类最早诞生于斯，而且为人类文明较早出现于斯和繁荣于斯奠定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辽阔的地域还为中国文化提供了可以在广阔范围传播与转移的空间，从而决定了中国文化史具有无比丰富性和波澜壮阔性特征。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各地区间农耕文化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和本质上的差异性，而且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曾长期对垒，从而使农耕文化自身内部及其与游牧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和融合表现为异常激烈的状态。

中国疆域辽阔和地形地貌复杂及气候类型多样等特点，对于中国文化圈内不同文化区的形成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既有因气候和纬度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文化区，也有因地形地貌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文化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地域文化传播藩篱，同时也导致中国形成西北、西南、江南、东南、华中、华北及东北等几个特色显著的文化区。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曾有过几次颇具声色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但是，中国各主要区域所保留的地区文化特征基本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异。各区域内的人们仍然按照固有的文化模式生活在他们世代生息繁衍的那块热土上，牧童晨吹，渔歌晚唱，草地纵马，农事胼足，一切都呈现为一幅古老文化风情画的风貌，现代较之过去，只不过多了几分喧闹、繁华和文明而已。

如果说，中国文化孕育的多元性是由中国地理环境的疆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和气候类型多样的特点所决定，那么，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则是由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所决定的。中国大陆东南侧为浩瀚的太平洋，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都深入亚欧大陆中心地带，既是一个“右高原、左大海”^①的“大陆—海岸型”国家，又是一个地理上带有极大封闭性和独立性的国家。

中国版图所带有的“负山面海”陆海兼备特点，似乎与欧洲大陆并无二致。但是，对比两种地形地貌的不同，便会发现，欧洲大陆被深入内地的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等内海所切割，实际上是

①章太炎：《重订三字经》。

由几个庞大半岛和众多小岛所组成的大陆板块，使大陆腹地距离海洋也不过三四百公里，呈现为完全向海洋开放的“陆海交错”型地理特点。中国则不然。海洋并没有深入中国内地，除纵深程度较浅的渤海外，陆地基本没有被内海所切割，从而形成了中国大陆腹地远离海洋的特点。在太原、洛阳、武汉、长沙、贵阳等地以西，距海洋超过 800 公里的陆地占全国版图的 70% 以上，兰州、乌鲁木齐、拉萨等地，距海洋甚至多达数千公里，是世界上“大陆—海岸型”地理特征最为典型的国家。

中国所拥有的漫长海岸线，本来应该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顺畅通道。但是，在古代，这条通道基本没有被利用，相反，倒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无法逾越的屏障。浩瀚的太平洋不仅阻碍了中国人与外界的交往，而且使中国文化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文化观。固然，中国古人已经看到了海洋所具有的‘有鱼盐之利’，并出现过“官山海”等类主张^①，但是，这种主张还仅表现为海岸经济特点，根本不带有以海上交通和发展海运为中心的海洋文化主题。

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是由大海宽广无边、深不可测所引发的海洋神秘观。东汉班固即认为，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其上为一派海市蜃楼式风光。^② 因此，从齐宣王到汉武帝，历代统治者都把东方的大海视为神秘之域，认为那里有仙人居住，有长生不老药藏匿，于是才有希冀永生的帝王三番五次派人下海寻觅仙药的举动。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秦始皇派徐福率 500 童男童女下东海的‘壮举’，结果长生不老药没有寻到，徐福也‘终不见归’。

西方海洋文化却是以航海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古希腊由于负山面海，腹地狭窄，使海外拓展成为其文明发展的惟一出路，希腊

① 《管子·海王》。

② 班固：《览海赋》，《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山川典·海部》卷三百一十五。

人也因此成为“海上民族”。他们先后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殖民城堡和商业基地,到亚历山大大帝时便成为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庞大帝国,从而使地中海成为希腊人的“内湖”。进入近代以后,争夺出海口和海洋霸权便成为世界史的一大主题。在这场争夺中,先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后是荷兰人,最后是英吉利人占了上风,从而使大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国家”。甚至,本来是内陆国家的俄罗斯也不甘落后,依靠武力先后夺得波罗的海、黑海、亚速海出海口,开辟了摩尔曼斯港,侵占远东滨海地带,实现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出海口的意图,成为海上强国。

中国大陆所带有的封闭性,使中国远离其他文明中心,但内部又拥有异常广阔的疆域,这不仅决定了中国文化体系在其发生期必须独立完成,而且还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无比强大的融合能力,塑造了中国文化所带有的顽强自我保持能力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偏见。

无论是中国的文字和文学,还是中国的哲学和科学技术,都具有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特征,是在与其他文明隔离的状况下独立发育而成的。如文字。中国商代出现了甲骨文。这种用于表意的方块字与拼音文字截然不同,在其诞生和成熟过程中,没有受到过任何外来文字的影响,是世界文化中现存文字的惟一特例。在文学艺术上,中国诗歌总集《诗经》,其艺术特色既不同于同时代的以色列地区的《希伯来诗》所带有的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特点,也不同于印度的《黎俱吠陀》和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得赛》使用近似小说叙事和戏剧描述的手法,而是一种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抒情民歌。至于中国哲学,也具有独特范畴,其中的阴与阳、天与地、名与实、有与无、一与二、变与常、善与恶、动与静等,都与西方文化所谈的数量与性质、客观与主观、主要与次要、运动与静止、对立与统一等范畴截然不同。科学技术方面,中国文明为“实用—经验型”,而地中海文明则属于“实验—理论型”。这些都表明,中国文

明的发育完全是在与外界文明缺乏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

二、内化性与连续性

中国文化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带有的由文化先进地区逐步向落后地区扩展的“内化性”和文化史发展的连续性，则是由中国所特有的经济类型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

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最深的为农耕文化，其次为游牧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和主导，以先进的农耕文化对落后的农耕文化的渗透与改造，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为途径的；其壮大方式则表现为以中原地区为中心，逐步向外渗透，不仅表现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极强‘内化功能’，而且反映了中国文化史所带有的内化性和连续性特点。

先进农耕文化对落后农耕文化的渗透与改造，是中国文化史所具有的内化性特征的主要表现。在中国文明孕育时期，北方旱作农业耕作技术首先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使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而且使旱作农业成为中国文明孕育的主要经济类型。自三代直至东汉，中国文化中起统帅和决定性作用的文化主要为北方文化。在这种局面制约下，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的关系探讨最为深入，不仅使中国旱作农业“五耕五耨，必审以尽”^①以‘勤’字为特征的劳动力投入和‘多粪肥田’^②以土壤能源回归和补充为本质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得到充分发育，而且形成了天人合一这个中国文化的灵魂，并由此派生了‘以农为本’^③以民为本”、‘重本抑末’的‘理国之道’^④，问世了‘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观，使之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控制模式和民族意识。

① 《吕氏春秋·任地》。

② 《荀子·富国》。

③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